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刘涛雄 黄文夫 启文 赵红
李千 吴明伏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刘涛雄 丁茂战
主编:管益忻
常务副主编:启文 副主编:白卫星
编辑部主任:廉明 副主任:刘立华
主编助理:方芳

经济学家

周报

第156期(总第268期) 2016年7月8日 星期五 丙申年六月初五 投稿邮箱:jxjz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刊订阅方法: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劳动力使用价值的辩证认识

—《资本论》学习体会之三

66 在这里,马克思又认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而且是人类的抽象劳动,它生产和增值价值,资本家看中的正是这样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如此看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同于物的使用价值的地方是,它具有两重性的使用价值特征。 99

■ 李松龄 湖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因为劳动力作为生产力中的活要素,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才能实现有效配置,因此而被作为商品交换。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这种特殊的,能够生产商品价值而且能够生产大于自身价值的劳动力商品的研究,认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必要劳动价值与剩余劳动价值、资本与劳动进而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对立统一关系的。即使撇开劳动力商品这个概念不说,人类劳动区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也是必要的和现实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说清楚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财富的积累的性质和原因。然而,在一个分工日益复杂的人类社会,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不可能没有交换,因而不可能没有商品。所以,劳动力商品就同物质商品一样,不论你从感情上如何地不认同它,它还是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社会,资本主义世界是如此,社会主义世界也是如此。劳动力商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客观存在的事实,要求我们不只是对劳动力价值,而且必须对劳动力使用价值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作出辩证认识;不只是因为需要发挥它揭示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作用,而且更需要挖掘它赋予新时期创新创业的理论内涵。对劳动力使用价值的辩证认识,需要建立在同物的使用价值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深刻理它的内在特征。

马克思将物的使用价值定义为物的有用性(《资本论》第一卷48页)。那么,物一经生产出来,它的有用性就是不变的,或者说它是客观存在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物的使用价值的一贯认识。其实,物的有用性是人对物的关系,对某人有用的物可能

对另外一个人作用不大或者没有作用。生产资料对生产者来说是有用的使用价值,而对消费者来说则是无用的使用价值。即使是同样的生产资料,对有的生产者是有用的,而对另外一些生产者则可能是没有用的。如果仅仅把物的使用价值理解为客观存在的物,上述现象恐怕难有合理的解释。人的主观性和物的客观性对使用价值来说,历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物的有用性,是相对于人的需要、评价和认可而言的,物的使用价值体现的是人和物的关系。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能否像物的使用价值那样定义为劳动力的有用性呢?从马克思关于物的使用价值是由具体劳动生产出来的,具体劳动就是有用劳动的认识来看,似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可以被认为是劳动力的有用性。但是,马克思又有这样的论述,“劳动力的占有者提供他的劳动,实际上只是提供他已卖出的使用价值,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资本论》第一卷210页)。在这里,马克思又认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而且是人类的抽象劳动,它生产和增值价值,资本家看中的正是这样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如此看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同于物的使用价值的地方是,它具有两重性的使用价值特征。

“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劳动和智力的总和”(《资本论》第一卷195页)。也就是说,劳动力从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人的先天和后天形成的东西,它存在于人的活的身体中,不能离开人而独立存在。所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受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的影响和制约(当然,思想和精神也可以认为是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内容但又不尽然)。人的思想境界高,精神状态好,他在劳动中发挥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就大;思想境界不高,精神状态不好,他在劳动中发挥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就不可能很大。思想与精神的状态,影响和决定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稳定性。人具有政治性,同时也具有经济性,政治性体现在思想与精神上,经济性表现在利益追求上。较高的经济利益有利于调动劳动积极性,发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较低的经济利益或

者没有经济利益,则不可能长时期地调动劳动积极性和发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更有甚者,如果思想与精神处于一种叛逆状态的话,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仅难以发挥出来,而且还有可能形成破坏作用,工人不满资本家的剥削而破坏机器的行为就是例证。所以,劳动力使用价值的不稳定性,不只是影响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也影响财富的创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我国,无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用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用的经济利益杠杆和加强劳动管理,都是为了克服劳动力使用价值的不稳定性。

辩证地认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现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就劳动力使用价值的两重性来说,它一方面表现为劳动的有用性,即有用的劳动才有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劳动的抽象性,即能生产和增值价值的劳动才有使用价值。曾经,我们对基于劳动有用性的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研究太少,而对生产和增值价值的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研究不遗余力。我们认为,对于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研究,既要分析基于生产和增值价值的劳动力使用价值,也要探讨基于劳动有用性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基本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认为研究基于劳动有用性的劳动使用价值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了。例如,当前党和政府提出新时期创新创业的政策主张,其理论含义是什么,就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创新就是创有用劳动之新,创业就是创有用劳动之业,因为没有有用劳动之新,没有有用劳动之业,就不可能出现创新创业的大好局面。更何况,不提倡有用劳动的创新,导致的结果就可能是无用劳动,因为有用劳动的不断重复也就可能变成无用劳动。如果说在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大众需要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产品短缺的情况下,提倡或不提倡有用劳动的创新,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还不是很大的话,那么,在生活资料能够满足人们大众的需要,而且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提倡或不提倡有用劳动的创新,就是一个事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了。这个过去我们不太重视的劳动力使用价值的有用性定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意义和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能够生产和增值商品价值,能够揭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马克思的论述是非常经典和深入的了。不过,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资本家

劳动力价值大幅度提高从而劳动工资提高的时候,他都是通过有用劳动的创新即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创新来改良劳动工具,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相对剩余价值而获得超额利润。

劳动力使用价值因为其不稳定性而难以充分发挥,这是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关注和研究的问题。马克思眼中的资本家为了确保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稳定性,采取野蛮和不人道的管理方式,通过监工鞭挞劳动者,按照既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例如计件工资)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使如此,工人也以资本家始料不及的方式破坏生产。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基本上也是采取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的方式管理劳动者。但是,我们应该否定《资本论》中描述的那种资本家野蛮和不讲人道的管理方式。应该引进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使劳动者能够在一种思想愉悦,精神放松的状态下工作,以充分释放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当然,我们也需要把经济利益和人性化管理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宣传教育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以调动和发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由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具有多元化的性质,既有体力劳动的使用价值,也有脑力劳动的使用价值,因此,不能运用一种管理制度就能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使用价值都充分发挥出来。现在,我国的教育部门和科技部门基本上是学习西方国家管理体力劳动的方式来管理脑力劳动。所谓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就是以量化指标对生产过程中的工人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对于体力劳动来说,能出千篇一律的标准化的物质产品,而对于脑力劳动来说,似乎也能像物质产品一样出千篇一律的成果,但却难以出思想性和创新性的精神产品。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一种有思想性的使用价值,因为它注入了人的灵魂,这是我既具有不稳定性,又能够出思想性成果的重要原因。所以,管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尤其是脑力劳动的使用价值,要十分注意它是一个有思想性的,善于钻制度空子的有灵性的东西。一种好的制度安排,能使脑力劳动的使用价值迸发出创新性的思想火花;一种不好的制度安排,有可能使它滋生不良的寻租行为。就我的认识来说,量化指标管理就是那种难以使脑力劳动的使用价值迸发出思想火花,却很有可能导致不良寻租行为的制度安排。有关这个问题,学界已有不少人作了精辟论述,也不是我三两句话就能够讲清楚的。如果用一个通俗的比如,倒能把它们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一种好的制度安排,能使坏人变成好人;一种坏的制度安排,能使好人变成坏人。

中国面临改革与增长的艰难平衡

■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显示了好转迹象。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的财政和货币刺激举措已开始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然而,对于这个似乎是好消息的情况,中国国内的反应却一直十分复杂。

房地产业再次开始增长。尽管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下降,钢铁、铝和煤炭价格却已大幅上涨。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涨幅则升至2%以上。

不过,尽管部分经济学家相信,要想让中国恢复其潜在增长速度,就必须采取刺激政策,更多经济学家却担心,中国政府正在重返投资和信贷扩张来驱动增长的老路。今年5月8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曾发表对一位“权威人士”的罕见访谈。这位“权威人士”对中国经济表达了旗帜鲜明的意见。他最具争议性的观点是,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也就是说,他预计中国眼下的低增速将持续下去。与这种看法相一致的是,他强烈反对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增长,并认为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

“权威人士”的观点向市场传递了喜忧掺半的信号。人们相信他的看法代表着中共对中国经济的解读。而由于上述表态与中国政府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刺激性举措相冲突,市场对于中国政府的意图感到困惑。

“权威人士”的部分担忧有充分理由。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正在下滑;投资增长一直主要靠地方政府投资拉动;债务增长十分迅速;一季度货币供应增加了8.61万亿元人民币。看起来似乎中国经济正在重返旧的增长模式——这一模式严重依赖于地方政府通过举债融资的财政扩张。

然而,这一评价必须放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中加以考量。“权威人士”的主张背后,是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永久性结构转型,从现象级的两位数增长转向一位数增长的新常态。尽管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接受了新常态的提法,对于这种新常态下增长率将停留在什么水平却依然存在疑问。

而商业周期也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在多数中国经济学家看来,未来数年,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仍然在6.5%到7%之间。尽管2015年的官方数字是6.9%,许多人都对这一数字持怀疑态度。真实的增长率几乎可以肯定低于这个数。中国经济正处于衰退期——尽管是中国特色的衰退,即通货紧缩的同时增长率却仍然为正。因此,盲目否定一季度中国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并不合理。

“权威人士”发现的问题,更多地与中国地方政府和公共融资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有关。中国地方政府仍是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然而它们的行为却不完全由市场规律决定;它们也不是完全对选民负责——通过依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市场上发债,它们能规避地方人大监督。

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国政府提供基础设施的角色和其筹集资金的手段之间,存在着不匹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基建。然而这部分资金的回报率却很低。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投资的价值并不能完全用经济上的回报衡量,其社会效益也得考虑在内。因此,市场融资显得力不从心,不得不动用财政债务手段。

然而,地方政府却无权自行发行债券——尽管新修订的《预算法》如今已允许它们背上财政赤字。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当局来说,将短期的应急举措与长期的改革举措区分开来,也许更加合理。令中国的增长速度回复至其潜在增长速度是中国的短期目标,调整结构和改革则是长期目标。不过,上述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冲突。比如,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债券,不仅会解决基建项目公共融资问题,还有助于去杠杆,而去杠杆正是调整结构的核心任务之一。

中国经济的杠杆过高,然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放缓。我们从发达国家的衰落到学到的教训之一就是,如果国家试图通过降低整个经济体的信贷增长速度,实现消除过高债务的目标,就会导致进一步衰退。对于中国来说,扩大政府财务杠杆是消除企业部门杠杆的一条途径。这里提议的方案,是将政府的市场债务转移至其财政债务,而未必大幅提高政府的总债务。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不稳定的时刻。中国政府的政策必须在长期的结构调整和短期增长之间取得平衡。这其中的难点在于找到能同时达成上述两个目标的政策工具和改革手段。

■ 冯明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人民币汇率无疑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和全球金融市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人民币汇率的讨论既离不开其背后相对生产率变化、经常项目、国际资本流动等基本面因素,也离不开对汇率形成机制这一政策面因素。特别是在短期,政策面因素的重要性往往更为凸显。

按照人民银行的表述,今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并不复杂。其核心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在2015年8月11日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二是从2015年12月11日开始,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始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保持一篮子汇率基本稳定。

不过在现实操作中,汇率形成机制远比上述两点原则复杂得多,主要原因在于兑美元汇率和兑一篮子货币汇率这两个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

从技术层面来讲,我们可以将8·11之后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简单表述为“双锚相机转换机制”。简言之:人民币汇率以美元或者一篮子货币为参考,是为“双锚”;在某一特定时段内,选择两者之中更弱的一方为锚,是为“相机转换”。

学术界在2015年以来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声音非常多元化,但主流的声音大致可以归纳为两派观点:

一派观点认为,人民币名义汇率处于高估状态,应当贬值;更有人提出了一次性大幅贬值到位的观点。另一派观点认为,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大环境下,大幅贬值容易引起资本外流和金融市场震荡,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维持汇率稳定,汇改的窗口期已经关闭。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前一派观点称为“汇率贬值派”,将后一派观点称之为“汇率维稳派”。

两派观点可谓针锋相对,都建立在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之上,但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也都有弊端。这充分反映了2015年8月之后新一轮汇改所处的复杂背景。首先,新一轮汇改是在全球主要国家经济周期不同步、宏观经济政策不协调的大环境下展开的。第二,由于金融深化,政策变量和市场内生变量之间的联动更为敏感。第三,中国经济和汇率政策受到国外主要经济体和国际资本市场的空前关注,外溢效应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事实上,“8·11”汇改之后和央行在12月宣布参考一篮子货币之后,美国欧洲股票市场、大宗商品市场以及黄金价格都随即发生了较大幅度的震荡。

学术讨论可以假设、演绎,甚至为了强调核心逻辑可以对模型做出简化和抽象;但是央行作为决策者,则必须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进行理性决策。特别是当面临难以承受之风险时,即便出现“坏的情况”是小概率事件,也往往不得不做出风险厌恶的决策。

“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这是去年以来官方提及汇率政策时说到最多的一句话。如果对国内外经济大环境以及政策约束缺乏理解的话,那么从这句话来说,如果说第一层意思和第二层意思主要是说给公众和国内外金融市场参与者听的话,那么第三层意思主要是针对外国政策制定者,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说的。而且,汇率短期走势很可能会取决于双方谈的怎么样。

首先,对中国经济有信心。汇率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所以人民币汇率不具有持续性贬值的基础。其次,不具有持续贬值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短期的、小幅的贬值不会出现。最后,这个事情是可以谈的。

如果说第一层意思和第二层意思主要是说给公众和国内外金融市场参与者听的话,那么第三层意思主要是针对外国政策制定者,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说的。而且,汇率短期走势很可能会取决于双方谈的怎么样。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不稳定的时刻。中国政府的政策必须在长期的结构调整和短期增长之间取得平衡。这其中的难点在于找到能同时达成上述两个目标的政策工具和改革手段。